

劳动力技能互补的时空效应及其对城市工资的影响

◇朱纪广

城镇化的最大特征是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动。随着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镇。在过去30年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截止到2019年底,60.6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镇。理论上,大量人口向城镇集聚对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城市为不同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城市对生产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城市不得不通过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引入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同时,制造业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又吸引了大量低技能劳动者专门从事与体力相关的工种,从而改善了城市分工和技能结构。现实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具有偏向性,对低技能劳动力设置过高的门槛,形成“以业控人”的现象。如何优化政策设计,推动高低技能劳动力合理就业,提高城乡劳动者工资尤其是城市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实证结果

(一)基于时间效应的高低技能劳动力匹配

首先将两个高技能劳动力行业和两个低技能劳动力行业进行两两配对,分别计算其从业人口的相对规模;然后计算全局莫兰指数。结果显示,2004—2017年,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空间上呈现强相关性,这说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发展,高技能劳动力莫兰指数与低技能劳动力莫兰指数表现为相反的趋势,即高技能劳动力莫兰指数表现为高度集

聚,低技能劳动力则表现为相对分散,或低技能劳动力莫兰指数表现为高度集聚,高技能劳动力莫兰指数表现为相对分散。这表明以金融批零行业、金融住宿行业、信息批零行业和信息住宿行业为代表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空间上具有相斥效应。

(二)基于结构效应的高低技能劳动力匹配

基于耦合协调度方法,计算2004—2017年287个城市四组代表行业(信息和批零、信息和住宿、金融和批零、金融和住宿)高低技能劳动者耦合协调度。总体上,2004—2017年,信息住宿和信息批零具有倒U形结构,金融住宿和金融批零具有U形结构。2004—2017年,信息批零和信息住宿行业大致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金融住宿和金融批零行业大致呈现先下降再上升趋势。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2004—2017年,四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均在0.55以上,即耦合协调类型为中度协调型或高度协调型,这表明无论哪组高低技能劳动力,其相对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互为提升和相互促进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增长,会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促进城市规模扩大,从而实现城市不同劳动技能之间保持相对均衡。

(三)基于空间效应的高低技能劳动力匹配

将中国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区域,分别对比其2004年和2017年耦合协调度,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1)不同区间耦合协调度提升幅度不同。按照从大到小排序:华北(0.76)、华中(0.71)、西北(0.63)、西南(0.54)、东北(0.48)、华东(0.45)和华南

(0.26)。华北地区以京津冀为中心,对周边区域具有虹吸效应,能够吸引到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协调度上升;华中、西北和西南地区是低技能劳动力输出大省份,国家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低端产业转移和低端人口回流,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较低的问题;东北地区由于产业转型难,难以发展高技术产业,高端人才流失严重,造成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恶化;华东和华南地区经济发达,随着低端产业转移,带走了大量低端劳动力,加之城市生活成本高,低端劳动力难以在此落户,不利于耦合协调度的上升。

(2)区域内高低技能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从全国看,城市高低技能耦合度由2004年的0.63上升至2017年的0.69,这表明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度正逐步缩小,这将有利于城市高低技能互补效应的发挥。同时,在地区内部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度差异较大,如华东地区城市内部高低技能耦合度标准差由2004年的0.30增加到2017年的0.52;西南地区城市内部高低技能耦合度标准差由2004年的0.57下降到0.43;东北地区城市内部高低技能耦合度标准差由2004年的0.35增加到2017年的0.49。

(四)高低技能匹配对城市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

假设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在一定时间段内保持稳定,且低技能劳动者主要通过小城市向外界输出,高技能劳动者则更多地聚集在大城市或中型城市。那么为了促进不同地区劳动力匹配度的提升,小城市应当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防止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继续上升;而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应当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从而优化人力配置,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按照这个假设,本文探索不同城市等级,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和城市总体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果城市等级和工资水平、低技能劳动力和工资水平均呈正向关系,则得到结论:随着城市等级的升高,低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会对提升城市总体工资水平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本文用地区生产总值($\ln gdp$)表征为城市经济规模,用住宿餐饮业($\ln wrp$)、批发零售贸易业($\ln accp$)和交通仓储邮电业($\ln trans$)从业人员比重代表低技能劳动力比重,

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来代表城市总体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为了使我们的模型更加贴近真实的城市特性,同时兼顾社会公共服务对变量的影响,引入控制变量:第二产业比重($\ln indp$)、固定资产投资比($\ln igp$)、外商投资额($\ln fdi$)、科学技术支出($\ln scie$)、人均医疗床位数($\ln hosp$)、人均公园面积($\ln park$)。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和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估计高低技能匹配对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结合R²和AIC考虑,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从报告的结果来看,SDM模型中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交通仓储邮政业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上升对城市工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由于SDM模型回归系数不能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需要计算出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才能具体表征。

发现,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交通仓储邮政业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交通仓储邮政业的区域集聚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工资增长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即低技能劳动力比重的增加既无法直接提高本地区工资水平,也无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地提高邻近区域的工资水平。此结论与第二个假设不符,这可能是由于低技能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或低端服务行业,低技能劳动力在城市的集聚,造成企业买主垄断地位,低技能劳动力不得不以较低的工资就业。事实上,低技能劳动力集聚虽然无法直接或间接提高区域工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低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起负面作用。城市经济增长受益于周边地区低技能劳动力集聚,随着市场规模等级的不断提升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劳动者和各类经济活动会在报酬递增的作用下向市场潜力较大的城市集聚,通过这种途径提升城市生产力、经济溢出以及城市总体工资水平。经济总量规模($\ln gdp$)对城市平均工资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这表明城市规模增加可以提高城市内部平均工资。城市规模增加导致城市规模工资溢价效

应的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均会从城市规模扩张中获益。同时,经济总量规模对城市平均工资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城市规模增加阻碍相邻城市平均工资的提升。规模大的城市具有一定的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区域城市经济总量规模增加缓慢,进而影响城市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增加。

医疗基础设施与城市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对城市工资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吸引高技能人力资本,为城市工资增加提供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医疗和环境设施的改善,为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提供身心健康方面的保障,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心里的归宿感与认同感,有利于提高高低技能劳动力市民化意愿。科学技术投入为城市吸引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有助于促进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由低技能平衡向高技能平衡的转变,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从而促进工资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工资水平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外资规模并不是影响城市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产业集聚多由政策引导,且多依赖于本地市场,与外国投资关联不大。

二、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04—2017年间中国287个城市的实证数据,利用全局莫兰指数、耦合协调度分析,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对城市工资水平、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空间上呈强相关性,即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但分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空间上具有相斥效应。第二,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

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互为提升和相互促进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增长,会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扩大城市规模,从而使城市不同劳动技能之间保持相对均衡。第三,不同地区间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度提升幅度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为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北、华东和华南;从全国看,区域间城市高低技能耦合度正逐步缩小,将有利于城市高低技能互补效应的发挥。第四,空间杜宾模型(SDM)表明,低技能劳动力比重的增加既无法直接提高本地区工资水平,也无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地提高邻近区域的工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低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起负面作用。城市规模增加导致城市规模工资溢价效应的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均会从城市规模扩张中获益,但可能存在对邻近城市的虹吸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尊重市场自主性,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尤其是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高技术人才,吸引更多低技能劳动者不但可以解放他们的生产力,同时也解决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有利于互补效应的充分发挥。第二,扭转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歧视。低技能劳动力对于城市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是社会运转的纽带,城市的包容和接纳有助于提升他们对自己岗位的认同感和生活的满意度,使他们与高技能劳动力更好地分工配合,形成和谐高效的合作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三,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正当权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市民化服务,在孩子入学、租购房、医疗服务等方面保障他们的权益。

作者简介:朱纪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摘自:《经济经纬》2021年第6期)